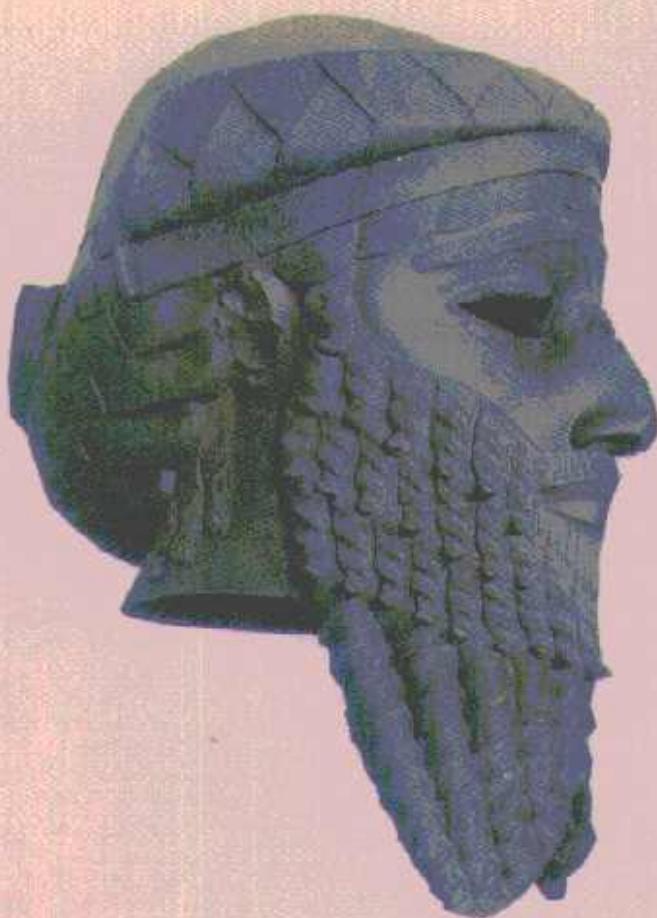


Staaten der Frühzeit
Ursprünge und Herrschaftsformen

古代的国家
——起源和统治形式

[德]罗曼·赫尔佐克 著 赵蓉恒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D031
H34

古代的国家

Staaten der Frühzeit

——起源和统治形式
Ursprünge und Herrschaftsformen

[德]罗曼·赫尔佐克 著

Roman Herzog

(德文版 1998 年 慕尼黑)

赵蓉恒 译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A0829649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8-181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成/(德)赫尔佐克(Herzog, R.)著；
赵蓉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

ISBN 7-301-03772-4

I . 古… II . ①赫… ②赵… III . 国家-古代 IV . D031

Staaten der Frühzeit: Ursprünge und Herrschaftsformen Roman Herzog.
-Zweite überarbeitete Auflage. 1998
© C. H. 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Oscar Beck), München 1998
ISBN 3 406 42922 X

书 名：古代的国家

著作责任者：[德]罗曼·赫尔佐克 著

责任编辑：张弘泓

标准书号：ISBN-7-301-03772-4/K·0253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北京华伦公司排版部 62756343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32开本 12.75 印张 318 千字

1998年10月第一版 199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绪 论

本书的宗旨，是要在今天科学发展水平所许可的范围内，将最早期的国家历史理出一个脉络。

在人所创造出的一切事物中，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就其对历史的影响、给历史打上的烙印而言能够同国家相比。早期人类就已经通过国家为尔后在技术上和文明上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础。早期人类又通过它，在一个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威胁的环境中为自己建立了秩序、获得了安全。然而还是由于它，人遭受了极为巨大的苦难。这种情况，肯定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对这样一项具有如此明显的两重性的“发明”进行一番追根寻源的探索了。

不过，我们在此给自己提出的这一任务，却又是充满了难点和令人深感困惑的。

历史上，有关人们共同生活的文字记载相对说来出现得比较晚，最早也是到了国家已进入相当高的发展阶段的那些时代才有的，而从那样高的发展程度，我们只能得出在此之前国家必定已经有了好多个世纪甚至好几千年历史的结论。然而史前时期发生的事，以及历史上的国家的早期阶段究竟是什么样子，在第一手文字材料中是朦胧晦暗的。

使用史学界所拥有的一般用来对历史上很早的时代进行研究的那些比较粗放的手段，去对付一种更多地是表现为思想和行动而非体现为实物的历史现象，想得到完全的成功是很困难的；由于这种历史现象的这一特点，它不可能简单地从地底下挖掘出来，像史前史和上古史研究中通常所做的那样。

因为,研究史前和上古历史的科学,一般都是面对地下发现的断壁残垣、各种艺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那些永不变质的陶制品。从这些物件中,这门科学可以引出关于早期历史上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迁徙,关于各种贸易关系、各居民点的建立和扩大等方面的结论。而那些地底下没有保存下来的东西——木制品、纺织品、皮革、纸张——,尤其是那些根本就不能进入地下的东西,对这门科学来说就意味着丧失净尽了。这里特别是指人的思想和人的社会生活。早期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是不能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正如早期人类的宗教、还有那——不论以这种或是那种方式——对人来说是命中注定摆脱不掉的国家、以及人的语言这些现象一样,一律无法从地下挖出来。

甚至连从出土文物中作出的某些推论多半也很成问题。在某地发现的一柄长剑,说明不了谁佩带过它,更无法说明该剑的主人是否曾在某个统治者的号令下使用这柄剑打过仗。从一些堡垒建筑和灌溉系统,诚然可以推论出它们在没有某个统治者事先规划、组织和强迫建造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产生的,但是它们对这位统治者是如何得到了这个职位、这一官职究竟给了他哪些权利以及他本人对此作何理解,却提供不了任何信息。甚至面对着一些规模很大的建筑群,如果要求今天的考古学家们有充分把握地说出这些建筑到底是神庙还是宫殿、当时居住在其中的究竟是一位祭司长还是一位国王,他们也往往一筹莫展,而关于现在时不时听到的“教士国王”这个概念,则直到今天为止对下面这点仍无定论:它究竟真正是一个完全贴切的正确的名称呢,抑或仅仅是一门找不到问题答案的科学于捉襟见肘之际所用的遁词?

关于基督降生前第二个千年代里的各个国家,它们的情况今天人们相对说来已经比较清楚,起码对较为过细地考察研究过的地区可以说。对于纪元前三千年代某几处史家研究得特别充分的国家,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和尼罗河几处河谷,这话可

能也是对的。但是，国家的踪迹却还可以追溯至更加遥远的古代。从几万年前冰河时代的混沌状态中脱颖而出的智人，其居住地就已经是按一种明显的模式来划分的了，这种模式既可能反映出游牧部落的头领们的规定和命令，也能反映出部落成员之间那种经历了许多代人的磨合才达到的齐心协力。因此，当时必定已经有了人统治人现象的零星踪迹。不过，知道这一点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现在已经可以肯定地说，即便用最先进的方法，今天也不再可能对这些最初的踪迹作出可靠的说明了。

但是，要说在人定居下来并逐步发展到从事农耕和家畜饲养之后的七八千年或者九千年时间里情形依然如此，这一点恐怕很难完全让人接受吧。怎么说从历史上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在下面这样一些人类社会群体中已经有了国家的萌芽：从这些社会群体中，我们至少可以推导出某些问题，而在历史科学中，要是对所发现的难于理解的史料能提得出正确的问题，往往就已经是成功了一半。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重新启航驶向新的彼岸那样一种局面不断出现，每次都有新问题要求解决，而人类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数量是有限的，因此，如果现存的资料能使人更多地推测出某一个解答而不是所有其他可能的答案，那么，总可以在无法看到确定性的时候至少看到一些盖然性吧。

人们或许会把这种做法叫做主观臆测——用主观推测的办法去回答那些一般要求答案具有科学的精确性的问题，理所当然地会令人不以为然而不敢苟同。但是必须考虑到一点，即没有主观推测或思辨也就没有科学。没有主观推测，首先就不可能有假说，而没有了假说，任何科学地加以证明或者驳斥的对象不也就不存在了吗？因此，在科学问题上同时也运用想象是正当的、合法的，只要对哪些论断确实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哪些说法是主观推测或思辨的产物时心中有数就行了。不管怎么说，在已经不可能

获得确凿证明的情况下,一个立论有据的推测,总比那种装腔作势、以科学自诩、处处要求完满的证明而结果却只能炮制出一堆空话连篇的文字的“科学”,要来得更有价值些。

另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困难:那个无疑在我们所探讨的问题中占据着中心地位的**国家概念本身**,就远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

当然,每一个打开本书的读者,都会对国家究竟是什么有他自己的明确想法。但是他可能会——举例来说——将自己关于古代雅典诸城邦的知识拿来同他关于 1988 年的美国的知识进行比较,或者是把他关于苏美尔神庙国家的知识拿来同他关于戴克里先和列宁的庞大国家的知识作一番比较。他会问,为什么一些举足轻重的科学家不承认那些游牧民族的大国——其中包括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的地跨几大洲的庞大帝国——是国家,为什么另一些科学家要把国家在历史上起始的时间定在近代,即还不到四百年之前。而当他考虑了所有这些问题以后,就会认识到国家这一概念实在是不明确的,就会看到并不仅仅是研究方法有时使人得不到准确的研究结果——而是研究**对象本身**就没有完全确定下来。

基于这一认识,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本书在下文中从历史上选择出来进行研究的现象将尽可能包罗面广一些。在这里也同在许多别的地方一样,先将许多现象包括在考察范围之内而后再剔除不必要的部分,比先观察少量现象而同时却忽略了重大问题要好些。

我们要探究的最原始、最根本的现象,是**人对人的统治**。这种统治,从第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的命令那一天起就开始了。然而统治的存在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诚然,没有统治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可是也存在着一些由人组成的群体,在那里虽然实行着统治,但却没有人将它们称为国家;只要想一想家庭或是某个经济企业就清楚了。由此可见,要成其为国家,除了统治之外还必须有另一个标准,而要找到这个标准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也许可以考虑用各个人统治人的群体的大小作为衡量标准。这个想法肯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此我们将在本书一个特别敏感的地方在**贵族统治单元**和**贵族国家**之间作出比较严格的区分。不过那时读者也会看到仅仅作这样的区分仍然是不够的（见第158等页）。此外，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我们的语言里摩纳哥侯国也被称为国家，同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大国毫无区别。可见，寻找一个可以一锤子定音的标准，这一探索过程现在还没有结束。

接下去，**定居**就在史学文献中被人提出来作为另一个区分标志。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第一，今天家庭一般说来也都有固定的居住地。第二，不承认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等游牧民族建立的大帝国是国家，那是很困难的。第三，还有一条最根本的理由：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从一些过游牧生活的、贵族统治的部落国脱胎演化而来的（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所以说，如果用定居这一概念作为标准，那么我们无异于把自己的眼睛蒙住，看不到今日国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源，而对游牧民族择地定居的意义估计过高，超出了它自身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在从游牧状态转变到定居状态的那个时刻，社会群体的组织形式和统治形式还没有丝毫变化，要起变化，需要有许多代人甚至是许多个世纪的发展过程才行。

另一类对国家下定义的尝试，认为“内部主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内部主权，指的是一国的统治者面对所有其他在同一地区活动的强国表现出能够坚持独立自主。可是这样一来，国家的历史倒真是要从公元十六世纪才开始了。如果这个定义成立，本书固然还是得按照现在这样的写法来写，但却必须使用另外一套术语，而且——这是最关键的——是一套比较累赘的术语。再者：难道我们这些现代国家——谁都不怀疑它们是货真价实的国家——会仅仅由于它们偶尔不得不服从几个大康采恩或大联合体的

意志，就因此而失去它们作为国家的性质？

一个人统治人的群体所具有的各项职能，细究起来也还是不能提供识别国家的决定性标志。当然，人们可以将奥古斯丁的一句名言稍加变动，然后同意下面这个看法，即：如果国家没有若干合情合理的、为人们谋利益的任务，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巨大的强盗团伙。这一观点也将在本书中自始至终反复显示其重要性。但是，我们将会看到，最“典型”的国家所肩负的最“标准”的——适用于一切国家的——任务，在历史上是根本无法确定的；国家的任务不断在变化着，从拜神祭天、开发疆土直至防御外敌，从维护内部和平直到兴修水利以及兴建其他各种形式的基础设施等等，不一而足。而除此之外，其他的一些统治形式——经济企业、家庭、游牧中的部落群体等——当然也都有它们各自的极为重要的职能。国家并不是人惯于用来解决自己各种问题的唯一的组织形式。

看来，现在只剩下组织——更确切些说是长期设立的统治组织——可以考虑充作我们所寻求的识别国家的标准了。而组织，就意味着在其成员之间进行任务分配，或者换句话说，它表明已经有一些由某些人专职担任或者至少是连续担任的职务存在。一个仅仅为了完成某项时间有限的一次性任务（比如为了修建一座巨大的陵墓）而将他的部属召集起来的游牧部落首领，还不能说掌握着国家权力，但是一个国王，如果他能将一部由专职人员组成的官僚机构调动起来去完成一些周而复始地出现的任务，那么就完全可以说是掌握了国家权力了。

但是即使在这里界线仍然是模糊的。在我们刚刚提到的两个极端之间，横着一个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里包括这样一些组织：它们的成员只是一些临时召来的、但却具有专门知识的“业余人员”——如“后备管理人员”、“预备役军官”等一类人。恐怕不可能将所有人们举出来作例子的这类组织统统从国家概念中排除出去。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也许是组织的大小以及它是否长期

存在,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又面临着那种多级的、“游移不定”的过渡状态了。

由于上述这些情况,本书中便多处出现诸如“国家形式”、“前国家的”或者“类国家的”这样一些概念。至于比如卡尔·A·维特弗格爾^①用来称呼这类国家雏形的那个很中肯的说法“primitive government”,那么将它用在德语中并不合适,因为直译为“primitive Regierung”(“原始政府”)又容易引起一些错误的联想。

但是将这些国家雏形完全排除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外也不行;因为如果这样做我们便会失去太多的机会,对于考察今天国家的产生及它们最初那些阶段十分不利。因此我们也必须尽可能地兼顾它们。

于是,审慎的读者将常常不得不自己来决定从组织的哪一级起他愿意把“国家”这一表示属性的名词加在某一统治形式的头上。谁要是比较深入地思考过给事物下定义这件事的性质,谁就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因为,人类自从有了语言以来,向来都不是从是否正确、更不是从是否符合真实情况的观点,而一直总是从是否合理的观点出发为概念下定义的。对于一个像国家这样的复杂事物,不能指望情况会有什么两样。

^① Karl A. Wittfogel, 1896-, 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译者

第一部

关于早期国家的
一些推想

第一章 四千年前

本书从纪元前 2000 年——算是“标准年”吧——讲起。首先，我们将把这一年的地图展开在读者面前。然后，在接下去的章节里，笔者试图对国家及其雏形作一些探索，在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方法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尽可能追踪至比较遥远的古代。随后，将对国家如何进一步发展进行阐述，特别要阐述它在公元前第二千年代末不断向越来越广阔的地域扩张，以及一批大国和地跨几大洲的帝国的诞生，这些大国的出现，使国家的历史进入了全新的轨道。

把纪元前 2000 年定为起点，同每一种与此类似的决定一样，带有随意性，无法举出什么驳不倒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把它定在纪元前 2100 年或是 1950 年。然而为什么偏偏把切分点定在这一个时期中，却有着相当充分的理由。

首先，从这个时刻起，我们的历史知识大大地丰富了。诚然，在接下去的一千年中，也还有一些时期里即便在像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样的人类文化最古老的摇篮地区，也有历史资料源泉断流的情形。但是大体说来，从纪元前 2000 年开始，人类历史至少在这些地区基本上是连续地呈现在考察者眼前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纪元前 2000 年左右我们知道的那些国家的政治景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美索不达米亚，关于大国的思想在经过绵延数百年之久的、不断反复的初试之后逐渐成型，并在实践中获得了持久的胜利；巴比伦人的王国以及稍后亚述人的王国，此时可说已经在扣历史的门环了。在埃及——仅从地理上看，

它就总是给人一种比较大的整体的印象——，同一时期随着中王国的建立，开始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形式的新时代。

与此同时，在一次规模巨大的迁徙运动——整个人类史都贯串着这样的大迁徙运动——中，新的部族群体登上了这段已知历史的舞台。塞姆^①人在这段时间里开始了他们的第二次迁徙高潮，胡里特人侵入了两河流域北部和叙利亚地区，而印度日耳曼人则即将一方面向小亚细亚、另一方面向印度次大陆大举挺进。

这样的大动荡、大转折时期给人们带来了数不尽的惧怕、不安和痛苦。已存在的文明和国家制度可以被消灭，大批民众可以被从自己的家园驱赶出去、沦为奴隶或甚至被杀绝。即便游牧民族的进攻被定居民族有效地击退了，但是大片大片的土地仍然可能变得面目全非。那些即使在获胜的情况下也难以避免的人员和物质财富的损失，在当时的农业社会中并不像在我们今天的工业社会里那样容易得到弥补；欧洲所经历的三十年战争，便是这样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劫难的最后一个实例。

然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样的时期，遭到进攻、生存受到威胁的人们必然会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防卫上。于是，政治的优先、特别还有经济的优先这一情况便起了变化。军事上的需要、军事上的组织形式和军事思想，继之上升到了主导地位——而在险境度过之后，它们却并不会自动退居次要位置。在这样的时期，国家就可能变得比过去那些比较太平的年月更加严厉、更加冷酷。

加之入侵的民族往往恰好在政治领域里也带来全新的观念和经验。一个世世代代一直处于游牧状态的民族，对于统治和领导的想法必然与一个在同一段时间里有可能过安静富裕生活的定居民族迥乎不同，并且它多半也可能已经创建了与后者大相径庭的统治形式，又不会是今天胜利地征服了一块土地之后，明天就放弃

^① 或译闪米、闪族。——译者

它们。赫梯王国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根本不同的组织结构,为此提供了一个雄辩的例证。

根据我们今天所掌握的全部材料,埃及和近东人民是一种高级文化^①、从而也是一种比较完备的国家形式的创造者,据上所述,他们在纪元前 2000 年时的确是处在一个大动荡、大转折的时期,这一情况使我们有理由将起点正好选在这个时候,从此起步来对国家进行考察。

纪元前 2000 年左右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

假如说在公元前 2000 年某位地理学者或政治家面前放着一张欧亚非大陆的地图,并且他想把那上面全部当时已存在着较大的国家制度的地区照亮,那么他——至少根据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只需要三盏小灯就够了。被照亮的,从西到东仅有:尼罗河河谷即埃及,约莫至第二瀑布,然后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经它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仅为它的泥沙所冲积——,最后则是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河谷。

这个结果,至少乍看上去显得出人意外地为数寥寥,特别是细究起来人们会发现,这几个地区中没有哪一个才仅仅处于其政治组织的初始阶段。每一个地区当时都已经有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政治制度了。又因为这些地区除此以外还同当时已知的世界上的广大地区自远古以来就进行着贸易,并且这种贸易决不只是扩大原料和商品的销售,而且同时也总是传播思想和经验,所以人们据此倒是可能会设想国家应该有更大范围的扩展才合乎情理吧。

为什么情况并不是如此,这我们大概永远不得而知了。也许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当时国家在世界其他部分诞生的时机尚未“成

^① 即一种发展程度相当高的文化,也就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文明。——译者

熟”吧。但是因为谁也说不清这样一类套语所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时候对于建立国家才算是时机“成熟”，所以说这样的话也差不多于事无补。

另外，问题或许在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所有那些有能力创建一个国家的高级文化吧。毕竟，今天我们认为拥有极为古老的国家生活的印度河文明，仅仅七十年前人们甚至还不知道它的存在，再者，欧洲研究者的兴趣之所以很早就被引导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撇开金字塔不谈），只是因为圣经中为它们的存在提供了异常雄辩的佐证罢了，最后，赫梯王国虽然在圣经里多次提及，也只是在四、五代人以前才发现的。所以说，地底下还埋藏着这样或者那样尚待发现的意外惊喜并非完全不可能。实际上我们也确实知道在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曾有过一些较小的国家，或者至少是一些建筑物，它们标志着那里曾经形成过某种类型的统治，而对于这些古建筑，我们直到今天也常常还不知道它们仅仅是一些发展得特别完善的个别现象呢，抑或是一座大得多的冰山的尖端？

埃及，在我们眼里始终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大治社会的范例，它在纪元前 2000 年左右刚刚度过了衰落瓦解和危机重重的一百年，开始重新走上建立强大国家形式的道路。从公元前 2150 年到大约 2040 年，古王国逐渐衰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各州诸侯和相互竞争的地方王朝之间的激烈混战。几百年来对努比亚各部落的控制影响也旁落了，游牧的塞姆人从东北面袭来，侵入了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

但是，到了纪元前二十一世纪中叶，建都上埃及底比斯的第十一王朝的法老孟图霍特普一世（纪元前 2061 – 2010 年）逐渐从政治上排挤了以赫拉克列奥波里为中心统治着下埃及的第十王朝，削弱了各州诸侯的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收复了努比亚，将南部疆界重新推至第四瀑布，创立了埃及的中王国。